

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探索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

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研讨会

政策研究与建议

为支持和配合目前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12月13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举办了“借鉴国际经验与教训，探索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改革的目标与路径研讨会”。会议特邀了国内10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名教育专家学者进行研讨（详细名单见附录）。

本次研讨会是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主动参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与会专家就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见解精辟。经初步整理和论证，我们将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和建议简要提供如下，期望能对当前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参考。

由于研讨会所涉专题广泛，多种观点并存，故我们并不企望对每个观点都达致共识。加之目前的教育改革尚处启动阶段，因此，提出问题可能比寻求答案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尽量将各位专家发言内容忠实的展示出来，既避免失真，也力求使他们的观点和内容更为贴切。

我们提出这些观点所遵循的理论依据，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置于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和检视。

一、 纵向考察

今天，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教育改革成就之际，我们开始了新一轮教育改革。当然，对30年伟大成绩的赞颂，这是有必要的，也是不可抹杀的，但回顾是为了前行，是为了确定我们面向未来的目标和方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找出问题更重要。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能不能继续用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方式来发展今后的教育？或者甚至于用文革前17年的某些经验来指导教育改革？回顾我国30年的教育改革，深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下面我们将我国30年的改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的经验与教训分别予以简要点评：

第一阶段：70年代到80年代初，是恢复和重建的阶段。在此阶段，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任务，但是到70年代末，教育界的思想解放是半途而废的，没有完全的拨乱反正。它只是恢复了一个需要发展教育、重视教育，重新建立尊师重教的概念，但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在面向80年代的一个新起点上，没有提供新的回答，而是简单地回到50年代的模式。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教育问题都是在我们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方式下固有的，并不是新形成的。包括教育理念、管理体制、教育方针、培养目标等等。说明经过30年的改革，教育体制和软件的更新没有完成，我们的教育实践基本上是沿袭了上世纪50年代的许多做法。鉴此，教育领域的思想解放没有完成，今天仍然需要补课。

第二阶段：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教育体制改革的阶段。80年代教育改革有非常丰富的可以重温和继承的遗产。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有两点。第一，当时中共中央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放到一起，同时提出，把教育、科技和经济改革是放在并重的位置上。这个价值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超前的。第二个重要的遗产是非常明确把体制改革作为中心议题。明确指出要对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革。

第三阶段：90年代初到03年，所谓教育产业化的阶段。遗憾的是，到了90年代以后没有将前一阶段的两个改革遗产继续深入下去，教育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其间医改房改的方案都先后出台了，可教改的方案才刚刚提上议事日程。90年代以来主要是围绕弥补教育经费不足，或者单纯财政市场的教育改革，或者教育改革的经济模式来展开的。把教育当作高度营利性的事业，所以教育在媒体和调查中成为十大暴力行业、五大腐败重地之一，这是前所未有的。教育体制、教育公平等方面都受到严重的伤害。

第四阶段：03年以来，围绕科学发展观进行新转型的阶段。因此，今天确定面向未来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理想，还是要矫正教育产业化，要重新恢复常识，教育到底是做什么的，公办教育是干什么的，政府的教育职能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在清理、思想解放的基础上确定面向将来的新规划。要随着近年来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求来改革和规划中国的教育发展。

二、 横向考察

如果说纵向考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弥足可贵，那么在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中国更应以全球视野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对处于同一个“全球教育体系”许多国家来说，全球化引起的问题往往带有某种共性。由此，不仅中国，世界所有国家都应实行“改革”和“开放”就成了时代的必然性。这种因各国“开放”而产生的改革成果都应被视为是

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我们的领袖曾经告戒我们要吸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那么注意借鉴当代各国“改革”和“开放”的经验与教训就更具有了时代的现实意义。

以处在知识经济最前沿的美国为例，如果根据国内某些学者的观点——增长 ≠ 发展 ≠ 改革——，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改革就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是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的 20 余年。这是美国为适应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新的产业革命的需要。美国这场教育改革可用三句话来归纳：教育改革的激进性和曲折性前所未有；教育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无与伦比；教育改革的形式和内容新颖独特。

1、其**改革动因**是使落伍的教育系统尽快适应新的产业革命和时代变迁的需求。在时代变迁过程中美国未能及时对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因而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今后要多多反省自己的教育政策，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经济之需要，不要动辄责备他将美国的就业机会抢去了。美国的这些教训，也是中国教育改革中必须引以为戒的。

2、其**改革目标**是实现从“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到“为所有儿童提供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的转变。并且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从注重投入向注重产出”和“注重过程向注重结果”转变的理念，实现了理念与制度的变革。

3、其**改革路径**的特点是：

- ① 教育改革的主导中心从教育系统内部转移到教育系统外部；
- ② 教育改革的主导力量从教育界专业人士转换到企业界、非政府组织、联邦和各州政府。

美国近年来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由于上述的企业界、各类非政府组织、智库、政府机构、媒体及学术界等积极参与，使得教育界在教育改革中反而被边缘化，从而导致教育改革的主导中心从教育系统内部转移到教育系统外部。

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日益暴露出的教育问题使美国联邦政府受到来自各方巨大压力。社会各界要求和呼吁联邦政府承担起领导教育改革的重任。经政界和社会各利益集团数十年的反复争斗和博弈，尤其是联邦政府从 80 年代末和整个 90 年代持续不断努力。最终在 2002 年倾全国之力，达全民共识，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该法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历史上首次形成了全国性教育政策。

对于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有几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一，对我国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更有引以为戒的教训；第二，美国今次教育改革的动因、目标和路径前所未有，只能产生于

知识经济时代；第三，对于这些特点，我们有系统的研究，并附有翔实的数据和图表佐证，可随时提供。

国际经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启示

1、 **明确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 --- 中国目前面临着“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行教育改革中充分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制定的教育发展规划要切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2、 **以邓小平“三个面向”指导教育改革** --- 由于我们目前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为应对共同的挑战而实行的教育改革的经验更具有互相借鉴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决不能将我们的视野停留在眼前的成就，也不能仅仅将我们的思维局限于已被历史证明脱离社会实践的某些传统理念上，我们应始终将中国的教育问题放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进行考察和检视，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制定出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发展规划。

3、 **全面和准确研究国际经验与教训** --- 信息化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同步或即时预测国际发展动向和趋势。近年来，国外有些国家的教育改革力度和深度较大，而国内有些研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跟上，甚至有误导现象。我们认为通过正确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将真相介绍给国内，避免误导，这样才有助于及时地调整我国的教育政策和规划，可最大限度地降低失误的可能性，甚或完全避免发达国家所走过的某些弯路。

4、 **注重全社会的参与** --- 由于教育问题涉及到家家户户和国家与个人的未来，教育改革是否有社会各界广泛和深入的参与直接关系到教育改革的成败及未来教育发展规划的执行力。建议要重视在改革过程中整合和凝聚民众的共识，可以对诸如为什么要改革？（动因）、改革什么？（目标）、怎么改革？（路径）、谁来改革？（主体）进行广泛的讨论和对话，使这次教育改革真正上升到全民的意志。

5、 **氛围与时机问题** --- 从策略层面考虑，建议目前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中将教育发展成就讲深讲透的基础上，也在适当的范围和层次深入探讨一些阻碍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另一个问题来自于客观，由于恰逢金融危机，民众关注的主要焦点聚集在经济问题上，对教育问题的关注相对减弱了，这就为教育改革提供了难度。当然，如果处理妥当，也是完全能克服的。

三、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社会背景、理论和正视的问题

针对这个专题，与会专家着重从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社会背景、高等教育发展

方式转变的理论问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实践中必须正视的问题三个方面提出了很重要的论点和建言。而这些问题的由来，全缘于我们又处在新的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和新起点上。这些新的变化既反映在国内社会发展方面，也反映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和发展方式方面。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社会背景

1、 **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国家正在社会转型，原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转变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并以社会事业为重点的发展转型，要求教育发展目的与立足点不仅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教育需求，还需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多样化、选择性教育的新需求、新期待和利益诉求。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用文革前 17 年或是用 30 年来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方式来发展今后的高等教育是否完全可行？在梳理过去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应舍弃过去的外延式、粗放式、超常规、破坏生态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寻求新的发展方式。

2、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背景看，经济界已经有了基本结论：就是单纯的工业化不是靠发展两翼结构，而是从单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转型。这就要求教育发展必须解决融入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改变教育发展滞后或独立于社会发展的状态。

3、 **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前一段城市的发展是搞经济特区，然后搞中心城市极化发展，到现在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那么教育形成体制要不要改革？接下来按照规划的要求，我们发现将遇到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要重新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管理的体制问题，另外一个是在区域性的问题，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从高等教育来讲已经提出了越港澳的协调发展、环保改革的发展问题、整个东北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西部的开发等等。高等教育是以原来的形成体制在扩展的，如果以这种发展方式转型，教育一定会受到影响并作相应的调整，要求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必须解决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及教育公共管理的职责分工和合作关系。

4、 **政府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型。**政府已经意识到，也已经在做了，改变了权力集中甚至垄断。教育也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从政府行政部门权力集中、职能垄断到简政放权、权力制衡、“大部制”为特征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型，要求教育改革发展必须解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行业部门共同实施教育公共服务、教育公共治理的职责分工和合作的关系。

（二）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问题

1、 **发展观的转变。**这就过渡到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有哪些理论的问题。首先是发展观的转变，要重新认识“为谁发展，发展为了谁”，即教育价值观的回归，就是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问题：教育为了什么。所以现在提出“以人为本”，要重新回到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教育经常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它发展学生的什么，这是有讨论的。比如人的个性的发展，人的全面的发展等等。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不解决这个本源问题的话，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考虑到这个方面，我们新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是否要改变为服务于人文发展、服务于人生与社会发展、然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次序？是否应该颠倒一下？因为前几大的教育方针我们都知道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然后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与教育相结合。刚刚提到教育为人民服务，那么是不是要提出教育为人的发展，教育为文化，教育为民生服务。

2、 **发展目标的转变。**其次是发展目标的转变，这个在高教界的讨论也比较多。教育到底是为社会发展还是为自我发展服务？有一些机构提出，教育要适当地跟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跟着它一直在变。还有一个独立的，教育可能是还要走出一个自己的价值。这些东西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我们是不是要提出来？这是有一个转变的。

3、 **发展主体转变。**再次是发展主体的转变。发展依靠谁？谁是发展的动力？发展靠制度培养还是靠引进？我们的大纲、指导思想、教育方针里面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教育中“人”很重要，即教师，那么一切要为了教师的发展，一切要依靠教师的发展，只有提高到这样一个角度才能形成这样一个转变。实际上教育发展的改革最后需要落实的是教师潜力的发展和发挥。与这相关的就是真正的大师不能只靠引进而是要靠制度的培养，依靠自主培养与按需引进相结合。真正一流的大师是不可能引进过来的，特别是一些核心的东西是无法引进的。

4、 **发展途径的转变。**“如何发展，依靠什么发展”，一般来说是从数量规模的发展到质量效益结构的发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从物质器物为主的发展到制度精神为主的发展。中央的四万亿救市计划中也有教育的一块，是不是还去盖大楼，还去搞物质性的东西？因为从这些器物性的东西，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除了少数的地方以外，从外形，从教学大楼、从外观、从他目前投入的量来讲，已经可以和世界上的一流大学相媲美了。除了大师、大楼，我们还要有大任、大爱，要有使命和责任，实现硬实力到软实力的转变。

5、 **发展归宿（落脚点）的转变。**高等教育到底发展得怎么样，是靠自主创新发展，还是靠一味地借鉴别国经验发展，实际上还是一个发展道路的问题。要探索中国特色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有个特点，他是外生型后发型的，他不是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中产生的。现在的高等教育制度不是产生在中国而是产生在国外。另外，我

们是后发型的，人家在十二世纪就开始了，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而我们是后面追赶的，是政府为主型。现在就牵扯到教育的评价问题，我们能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评价全国这么多的高校，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个多样化的开放的系统，这都需要讨论。

（三） 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实践中必须正视的问题

1、 **教育发展价值取向。**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战略选择。在教育发展效率优先的理念指导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有效推动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后，如何以教育公平优先为指导思想、以均衡发展、提升基础为主战略，服务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2、 **教育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取向。**是政府为主还是市场为主？就是我们讨论到的公益性与产业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一会偏向这么一个集团，一会又偏向另外一个集团。从国际发展的趋势来讲，应该是走合作共赢的道路。

3、 **教育行政管理方式取向。**教育形成管理方式的取向是集中管理还是共同治理，是不是要引进一些社会的公共资源？政府要从管制政府、权能政府、无限政府向服务政府、法制政府、有限政府这样的方向改革。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实施管制在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教育外延发展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内涵发展阶段如何解决政府失效、市场失效或综合失效，解决政府提供的缺位、失位或越位。走出政府以履行公共教育服务和社会管理为主、同时实施政府购买服务、吸收社会提供、社会参与管理为特征的教育公共治理的战略选择。

4、 **改革价值取向。**最后一个改变价值取向：是向集权还是增权的选择。改革说到底权利和利益的重新配置。我们建议公共的政府权力集中地往下放，然后市场失效的那部分适当地往上收，使公共权力进行重新配置，逐步使走向各方均权的方向发展。

四、 高等教育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现象

（一） 与会专家首先将最近收集的关于江苏省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与区域间的发展差异数据作为案例，就其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具体例证为：

1、 从总体而言，从2000年到2006年，江苏省研究生、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在校生数从69.1万人增至180.88万人，在校生占18-22岁人口的比例也从13%增至35%。

2、 当我们分析发展时，可以清晰看出其发展不平衡。例如：在包括省会南京在内的地级市共有13个，南京市内计有普通高校41所，占全省高校总数34.45%，其后是苏州市和无锡市，分别设有17所和11所高校，而宿迁市仅有普通高校一所。

3、 高校生数也存在区域差异。其一，在校研究生数的地区差异。南京市高校在校研究生比例占全省研究生总数71.45%，与之相形，由四个中心城市没有承担任何研究生教育任

务。其二，毕业生数的地区差异。南京和苏州本专科毕业生分别占全省毕业生总数的 45.08% 和 8.25%，最少的泰州市和宿迁市分别占全省当年毕业生总数的 1.65% 和 0.42%。其三，招生数量的地区差异。2006 年南京市和苏州市招生分别占全省招生总数的 37.79% 和 10.20%，全省招生最少的两市是连云港市和宿迁市，所占比例分别为 2% 和 0.25%。其四，在校生数的地区差异。2006 年南京和苏州市高校在校生分别占全省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 42.65% 和 9.26%，泰州市和宿迁市分别占 1.96% 和 0.15%。

4、 高等教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2006 年南京市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 917.81 人，全省每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最少的地区是泰州市和宿迁市，分别为 50.53 人和 1.03 人。

5、 适龄人口入学比例存在差异。2005 年底，江苏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平均入学率为 41.66%，苏南地区均高于省内平均水平，而苏北地区连云港和宿迁仅分别为 23.07% 和 20.46%。

(二) 针对上述案例，与会专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由于历史和社会经济的原因，我国几乎所有地区的高等教育结构都存在这种失衡现象，故讨论更有价值和代表性。为避免失真，我们将各种观点原文展示如下：

1、 江苏省教育厅的某些官方意见认为这个差异是合理的，这个差异和江苏省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

2、 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认为：虽然高校数量分布差异显著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但是，就全省和各个地区发展而言，这种状态显然需要调整。认为这些差异如果太大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差异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社区和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贫困地区和其它弱势地区的人才流失，从而对生产的布局等产生深远的效应。

讨论：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认为：这种不均衡对于高校布局本身就是一种合理。比如把一所大学放在南京还是盐城，对大学本身而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命运。为了照顾公平，更倾向于把大学放在南京，而给盐城更多的配额，让盐城的学生更有机会进入大学上学。否则，把大学建在盐城，最后可能使它成为大学不像大学、中学不像中学的怪胎。这对江苏省的发展反而是不利的。

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有两派观点。2008 年早些时候，有人提出应该把大学建在县里，这种说法是从大学的功能定位出发的。中国是中央集权，资源从地方逐级向中央集中，流向发达的地区。我国的大学之所以在北京、上海建得好，在县里却建不好，应该归结到中央集权的体制。但是很多时候，大学应该保持它的寂寞，在安静的地方做学问。把大学建在经济好的地方，大学和经济的关系一定密切。但是大学应该独立于经济和政治。所以现在才

有这个疑问：为什么越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才可以建好大学，偏远地区建不好？

讨论：我认为今天我们讲大学和古典式的大学环境完全不同了。对古典大学而言寂寞很重要，但对于现代大学环境很重要。以纽约为例，之所以商学院发展得好，就是因为华尔街就在学校的旁边，华尔街为商学院提供了大量的有利条件。如果是从别的地方把人先送到华尔街去，再回去建设，效率是否更高，我觉得值得怀疑。

讨论：刚才所讲的那种商学院适合建在纽约，恰恰是因为它和商业密切的联系。理学院就不一定要建在那里了。

讨论：我想，中国现在的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像您所讲的那样。等到有一天我们能像美国一样普遍地去建商学院，如果盐城少了学校，那么我们就建一所。但是目前来讲，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还没有发展到要求普遍地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修养的程度。我们的教育投入非常少，没有办法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布局当下还只能仅限于此。

从事该项研究的学者：我也认为很难回答高等教育地区差异问题。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区域差异对高等教育有负面效应。江苏省提出了教育现代化的口号，苏南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要在这个背景下来思考这个问题。像江苏省这样将高等教育过度集中，实际上是牺牲了苏北地区的利益来促成高等教育的发展。长此以往，对江苏省的发展会有负面的效应。我的基本想法是，差异可以存在，但是要保障落后地区的利益，或者保障利益的最大化，使各个地区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都获得利益。

讨论：苏北地区可以把学生送到南京去，因为南京的教学硬件和软件都比较强。但是这些走出去的学生回得去吗？现在早已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不实行学生毕业包分配，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就业，那么苏北地区凭什么优势吸引学生呢？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

讨论：我觉得您讲的是个很根本的问题。即便是把大学建到了乡镇去，学生毕业了最终还是离开。因此，只有建设当地的就业环境才能吸引人才。

讨论：这就是上次我在北师大讲的创意资本理论的问题。举例：上海杨浦区是除了北京中关村外没有第二家有大学密集度这么高的行政区域，共有 14 所大学，仅重点大学就 4、5 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学生一离开校门就离开杨浦区了。这几年的状况有好转。一个没有适宜环境来吸引人才的地区是留不住人的。但从长远来看，吸引人才也离不开大学和其它科研机构，否则一个地区的格调和品味很难提升。因此，着眼于将来兴建大学还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但这要经历一个过程。在目前来看，一个地区有大学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

讨论：大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两者何为原因，何为结果？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大学存在的原因，还是经济发展受惠于大学的存在？如果大学的存在是经济发达的结果，那么现有格局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的大学并没有对经济大发达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大学还不是地方经济发达的原因，那么这种格局就是合理的。什么时候大学和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时候，大学就可以回到地方去。

讨论：这和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我们不同，美国的大学从起点起就是建立在分权制的基础上，特别是社区大学。我们基本上还是教育部集权，尽管最近放了点权，但是和地方的关系不大。例如，杨浦区有这么多大学，杨浦区却管不了，它没有权利。美国则不同，以州立大学为例，拿了州的钱，必须为州里做点事情。不同的发展起点和文化社会的背景导致了中美的差异。

讨论：我认为高等学校举办的问题应该成为改革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把两级办学改为三级办学，即允许省以下的、地市一级自主举办高等学校。按规定，我国是由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但是有很多发达的地区，不论是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人口的比例都需要办大学。

众专家：地市级大学有了，现在允许了。

讨论：现在的现象是三级办学两级管理。县一级还没有。

讨论：我举个例子。深圳市现在有两所大学，一是深圳大学，二是深圳职业学校。他们强烈要求另外再建一所大学。现在深圳市有人口 1500 万，经济也相当发达。但是建校的提议被教育部一口否定，这是没有任何的道理，建学校又不需要教育部花钱。上面的借口是，高等教育应该从宏观上控制，总量已经够了，要往质量上倾斜，完全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实际上，一个地方该不该有、需不需要一所大学，当地最有发言权。还有一个例子是香港科技大学原副校长孔宪铎曾长期强调，在山东经济如此发达的地区，每个县都应该有自己的大学。他曾作了一个很详细的测算，根据人口的数量来规划学校的数量。最后建成了一个临沂大学。当然，这种大学并非都是学术性的，应该是面向当地社会需求的，不是追求高学历的、追求文凭的。

讨论：我非常同意您的意见。在美国县一级有自己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的财政主要来源于县，当然州政府也补贴一部分。您的那个疑虑也是个大问题。一旦把摊子铺开，学校都追求升级换代，大专变成本科了、本科变成研究型大学了，这个问题必须从萌芽状态扼杀，从观念上将其彻底改变过来，不能再重复以前的怪圈。

讨论：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破除教育垄断，该不该办学、能不能办学，有没有能

力办学应该由地方说了算；二是多样化的标准，按照地方的实际需要来办学。后者的关键是评价体系，现在片面地追求高学历是由评价体制来引导造成的。譬如，民办大学能不能搞研究生教育？如果民办大学不能搞研究生教育，那么就永远不能和公办大学相比。台湾的模式特别好。教授 60 岁从公办大学退休可以去民办大学，继续带研究生、带博士生，发挥余热。中国大陆退休学者可以进民办高校代课。但是因为民办高校没有学位点，所以不能带研究生。很多智力资源就这样闲置了。

五、 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经验系统推进高考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目前的基础教育负担重有很大原因是由高考引起的。迄今高考恢复 30 余年，可以说高考是改革最多的，但也是最失败的。近年的改革主要是对高考科目改革和录取方式改革。其中有：① 高考科目改革 3+X（X 包括 1+1，2，综合，综合+1 等等）；② 录取方式改革，如春考（2000 年），5%自主招生（2003 年），自主选拔录取（2006 年）、高职自主招生（2006 年），平行志愿改革（2002 年）。虽然改革频度很高，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进展。鉴此，经对目前高考现状的认真研究和严峻认证，与会专家提出以下时机和操作上均可行的高考改革建议：

（一） 5%自主招生改革

两条途径：

- 1、68 所自主招生的高校实行联考，避免各自为阵；例如可以由 985 高校联考或 211 高校联考，学生参与这个考试作为笔试的成绩，然后再进行面试。
- 2、把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进行，将高考成绩作为“学业水平考试”，自主招生学校以高考成绩为基础，接受学生申请，在 6-7 月一个月时间中完成自主招生，7 月按常规高考录取。

这样做既减轻了考试次数，考生负担，又解决了公信力的问题。像香港一样，把高考成绩作为申请大学的依据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由于我们的自主招生考试前置，基本上导致了高三一年沦为了考试年。

（二） 春季高考改革

春季高考还应保留，可以把春季高考视为学业水平测试，为自主招生高校提供笔试成绩。自主招生分为两类：一是高职高专的自主招生，二是本科院校的自主招生。

（三） 高职自主招生

高职学校全面放开，不参与高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23%，每年升学率近 60%。高考录取不报到主要集中在高职高专，每年有 70 万的录取不报到都集中在高职高专。既然

如此，那么高职高专可以全部放开。如果为了保证公平，那么我们以春季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进行申请。这样一来，今后高考的压力经集中在本科、一本阶段。

（四） 在平行志愿基础上改革

平行志愿是一种趋势（湖南、江苏、浙江、上海、安徽、辽宁的“大平行”，和北京等15个省市的“小平行”）。如果想借助平行志愿改革来弥补以前的问题，如学生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学校间等级分明等，那么要变一次投档成功为平行多次投档多张录取通知书，增加学校和学生的选择权。尽管这样会延长录取周期、增大录取成本，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基于当前的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现状，目前可推行两种改革模式。

改革模式一：学术水平考试+传统高考

1月或2月举行学术水平考试：自主招生高校（包括本科和高职）依据学术水平考试成绩自主录取学生，一名考生可同时申请若干所高校，在5月完成自主招生录取确认。

6月传统高考：没有参加自主招生的考生和没有确认录取的考生，参加高考，进行集中录取。

改革模式二：高考变为学术水平考试

将自主招生移到高考之后，以高考成绩作为申请的笔试成绩门槛，高校自主招生时间集中在6月至7月，每个考生可以同时申请若干学校，并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然后确认，之后集中高考集中录取。因为完全打破现有的高考体制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要将高考和自主招生相嫁接。

在以上改革模式基础上，再进一步探索多次高考、多次录取，拉大录取周期，增加录取次数。

六、 对“纲要” 研究过程的体会与体制改革的基本判断

与会专家中有些是参与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的研究与制订工作，他们从个人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了“纲要”研究过程的体会与感想。他们认为此次纲要的编订，从国家的重视程度到参与面的广度都是空前的。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除了企业界的人士外，参与面已包括各部委和各阶层人士。所以说从规模和参与面来讲，比以前都有所超越。

（一） 研究过程中的体会

1、首先是背景的变化，教育背景自身的变化。教育发展方式发生了转变，从以前解决数量的“温饱”型向解决公平和质量问题转变。这个从教育的政策话语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教

育培养的人和产业需求基本不适应。据调查：我国高端制造业人才奇缺，精密机床的人才缺口率是 75%。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3、再次，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社会结构与改革开放之初完全不一样，不同之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阶层的变化，原有的阶层被打乱了，形成了以职业为基础判断人的社会阶层的结构。二是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壮大。06 年全国数据是 34 万个，这仅是在民政部登记的，还有大量没登记的。这说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组织化，我们正处在公民社会的萌芽状态。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如果我们的教育管理还是政府大一统的模式，那就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社会的多元化和教育行政体制的一元化、封闭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三是微观组织的变化。例如村民委员会，现在的乡和原来的公社的差别，公司和原来的工厂的差别。现在的学校和以前的学校也不同了，以前的学校不仅要培养学生，而且要承担社会管理职能，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依赖于学校。教师和学校是人身依附关系。现在渐渐走向了合同关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专家：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高校学生交费上学。）各种利益主体都出来了，如果学校的内部管理还采取原来的统筹、包揽一切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不行的。

4、至于国际方面，我认为不能盲目照搬一些国际经验，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和他们不一样。比如择校，有人以美国也择校作为中国择校现象存在一个理由，那是一回事吗？英美等发达国家实行新公共管理，政府和管理者签订合同，建立指标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市场化思路，但是其扩大资源的目的与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所谓的新公共管理形成了对收费的依赖，使公共事业失去了公益性，变成赚钱的机器。所以不能与西方国家的经验完全一一对应。而且，有时候所谓的趋势只是个别的说法和想法，没有真正成为潮流，而我们往往当作潮流，当作主流的东西。比如奥巴马上台，很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开始左转了，中国没必要改革了，以此作为反对改革的理由。我们要看清是美国的左转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中国又是立于何种基础之上。

（二）对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判断

1、以前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和教育资源扩张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没有钱，就通过体制创新来扩大教育资源，达到普九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的。现在这些目标已基本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推动教育质量和公平、效率和教育结构等方面的新跨越。比如对于择校问题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应把所有好学校打乱，实行流动，取消公立学校中的优质学校，都变成均衡的资源。另一派认为应把好学校继续转制。这两派观点都有道理。但是如果继续转制，那么应该把转制和收费脱离开来。如果还是建立在收费基础上的转制，那就和政府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背道而驰了。这个变化反映到具体政策上，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

的认识。

2、以前教育改革的目的是适应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整个改革跟着经济走，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得慢，教育体制改革就无法实质性地推进。经济体制刚开始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了，就义无反顾地前进；教育体制从一开始的也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跟着市场化走。那么教育体制自身的目标是什么？2003年以后出现了一些新词汇，比如社会体制，这就给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方向，它不是单纯地适应政治和经济体制，而是将教育作为面向多元化社会的社会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构建中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的领域。教育的改革应该有自身价值追求过程和目标。当然还有更宏远的目标，比如人的发展、经济建设、社会和谐。

3、以前的改革是政府为主，自上而下，现在的改革应是多元参与，基层和学校的创新作为生长点。当然会继续以政府的创新为主导，没有政府也是做不成事的，但是要更加重视基层的经验和社会参与。

4、原来是渐进式改革，先解决相对容易的问题，难的问题往后放，最后积重难返。现在的改革仍然要坚持渐进，先试点、分步骤推进；但是看清了的要坚决下决心改革，必须突破一些难点问题，以前初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次改革一定要突破。譬如公平与发展的问题，教育继续发展需要很多资源，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但政府提供不了。如果让市场提供又涉及到公平问题，政府与市场中间还有社会。教育作为公益事业，如何在扩大非政府的投入的同时，兼顾到公平与发展，必须有个回答。还有，以学校为中心，政府、市场、社会、学校这四者的关系怎么处理，以及学校的行政化的问题，看清了的就要推进。

5、原来的改革是各方主体都得益，现在的改革如不调整利益格局，就难以推进。这个利益格局的调整要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既得利益者都是强势，只有政府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

6、教育体制改革包括投入体制、办学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等等。投入体制从原来的政府为主、相对单一转为多元，办学体制也从单一向多元化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也有了进步。办学和投入体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都要解决一个瓶颈：政府的教育行政体制，这是最制约教育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必须把它作为一个重点。

七、 教育创新与改革

（一） 教育创新

1978年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只重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忽视了自下而上的创新。知识经济时代，教育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核心就是创新。而要

真正实现这种创新，没有教育的创新是很难实现的。大学教育发展到今天，整个中国教育的变革一直都是在政府强大的控制力量下不断地干预、按照他的方案一步步地走，最终造成了一个万能的无能政府。一方面他万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要管；另一方面他又无能，每年大笔的教育经费投下去，国家需要的人才却没培养出来，国家不需要的人培养出一大堆，找不到工作。政府还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比如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开什么课和政府是没关系的，但是政府要管，搞教学评估和统一教材，使得高等教育中学化。

因此，要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解放和促进社会力量的发展。我们1985年开始搞教育改革，各地教委各地教育局设立了一个机构即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们对社会力量办学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采取了压制、排斥的态度。必须调动社会力量，才能真正促进自上而下地教育创新，才能促使培养模式直接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教育改革（三个比较具体的建议）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创新能力、创造能力要成为一个重要的核心目标。

3、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识到了，但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有些所谓的“教育专家”认为，中国人的创造力低下就是因为中国孩子学得太多太难了，美国学生学得好是因为美国的孩子学得容易，这个逻辑是荒谬的。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真正的问题所在。首先中国的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单一，这是很大的问题。美国初中高中有大量的选修课，多元的课程选修制导致了一个结果，给了孩子最大的自由选择和发展的空间。我们的研究生去美国学习，基础课程都是A，教师很喜欢，到了毕业设计不行了。“减负”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改变我们的课程、教学方式、学习方式，放弃我们务实的教学理念。

4、第二个是关于体制上的建议。希望中国下一步的目标是慢慢地能够形成一个以省为主、下设学区这样的体制。现在中国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要上一个台阶，普遍提高质量，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中国的教育是以县为主，而中国的县级财政之间相差很大。但要真正均衡发展，要提高质量，让县里做肯定存在差别，这是没办法的。之所以要以省为主，因为以教育部也做不到，国家财政没那个能力。以省为主，可能做到均衡发展，另外把责任下放给省，可能会引导从教育部放权下来，带动教育适应当地的经济的发展。立法、司法、执法、规划包括对贫困边远地区的补助，才是教育部的管理职责。

5、第三个建议是在东部地区、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要尽快向学校提出一个目标，要国际化的教育、国际化的中国人。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国企业的发展很快就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但是这个方面是我们最封闭的一块。大学缺乏一个最起码的国际视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八、 义务教育均等化与绩效评价

有与会专家用连续三年时间对中国义务教育的绩效进行了测评，据此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 经验与问题

1、我国的义务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的义务教育自 1978 年开始至今，用三十年的时间实现了韩国花五十年才实现的普及和免费的教育目标，中国在很困难的情况下普及了农村义务教育。这个成绩与我们根据中国的特点，发挥了制度优势，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采用了“先普及，后免费”的路径有关，而西方采用的是“先免费，后普及”的义务教育普及思路，因而时间长，花钱多而见效慢。

2、义务教育现在面临两大难题——资金和质量，尤其是质量问题，义务教育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我们在评价中发现义务教育质量的地区差异很大。我们不能走义务教育美国模式的路。美国提倡“快乐教育”，但忽视了学生基础和知识训练，恰误了二代人，到 70 年代，这一后果显示出来了，政府花了十年时间去寻找质量不高原因，最后发现是教育问题。90 年代，政府开始抓教育质量。这个教训十分深刻。现在，我国很多家庭并不富裕，但家长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是为了教学质量。通过我们三年评价，结论是中国义务教育的质量堪忧，有一个县，初中生有 40%不合格。看来，政府在解决了有书读后，重点应转向让孩子们“读好书”上。

3、另外，教育质量不等于教育负担，更不等于腐败。说不清楚这点就不是教育家。教育质量是指按大纲要求，让每个学生达到应知应会，这是学生的智力水平能达到的，也是学校应给予的。难道学生不应该应知应会，初中生连加减乘除都不会，才叫减轻负担吗？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教育部非但没有说清这点，而且一风吹地禁止考试，这是教育的重大失误。

4、我们不能过多地限制教育方式，应当将采用什么教育方式，是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就业教育，还是应试教育？让给校长。只要不违背人权原则，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家长满意的都是好的形式，而不必多加干预。政府关注点应当是结果：普遍的教育质量，亦即应知应会。教育部应围绕教学大纲来出题，引导高考和中考，而不是考题越怪越难，选拔出来的学生质量越高。

(二) 怎么解决质量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建议。

1、一是增加教育绩效评价体系。按“谁拨款，谁问效，谁用款，谁对绩效负责”建立绩效评价机制。绩效评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至少可以发现被掩盖的问题。有一个城市的私立学校的学生收费 7 千元，而公立学校生均拨款达一万多元，但教育质量不高。难道公立学校应当

差吗？对此，校长们认为，他们有能力比私立学校办得更好，关键是缺乏机制。

2、二是建立委托代理。现在，我国的公共管理陷入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这一问题上世纪在西方同样存在，为克服这一难题，他们在政府改革中引进了委托代理机制。政府花钱委托学校培养学生，政府关心的是学校培养了多少学生，质量怎样？等两个问题。至于学校如何培养，是学校的事。

3、三是建立公开机制。绩效评价的结果应该公开。公众应该知道义务教育的质量究竟怎样。政府不能愚弄老百姓。绩效评价的结果应该公开。家长应该有义务教育质量的知情权，有选择学校的权利。通过公开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再像西方那样，建立基于家长选择的教育竞争机制，则学校就不得不将教育质量放在首位，这难道不是政府花钱想“买”到的吗？

九、从地方高校的特殊作用论证评价指标的多元化

1、与会专家从某些地方高校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贡献来论证目前高校评估标准单一化的弊病。例如，温州大学原来的教育很糟糕，但是她培养出来的人在各行各业都是骨干。温州之所以发展很快，这些人对温州的贡献是很被认可的。我们后来发现引进人才成本很高，而且还要有不同文化之间的磨合，不如温州自己培养出来的本土化人才做得好。现在评价大学的指标不是按一般大学的常规来做的。如果按照常规指标来评价，温州大学的水平可能比北大清华还要高。温州大学对温州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按这个指标来看，温州大学是很不错的。如果按照一刀切的那些标准，那么温州大学就早该关门了。

2、现在温州大学以浙大的标准来管理学校，哪一点不达标，学校就掏钱弥补。挖过来一些有成果的人，表面看起来排名还可以，但是对于温州当地发展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不清楚。今年温州大学搞了本科的教学评估，唯一的好处是温州市给了他们好几个亿，让他们来完善教学评估的指标。19个指标，温州大学得了18个优，可是这到底有多大意义呢？而且把原来的特色抹杀了，说到底现在是拿钱买的是造假，而且造假不是偷偷摸摸的，是全校范围的，我们要反思一下。

3、专家认为，温州人精神很好，比如创业精神、开拓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等等，一般老百姓都有这种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能培养出具有创业意识、开拓精神和啃吃苦耐劳的人很少。大学要改革，但是像前温州大学这样的高校，只要为地方服务，设法把好的品质保留下来，给她一点知识，在原来的水平基础上再拔高一点，这样会比现在厉害。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不灵活了，都是出去找工作，创业的很少，学校管得越多越细，人为地把学生放在温室里，学生就养成一种习惯了，现在温州大学的教育模式是扼杀温州人精神的。

讨论：国家教育改革政策，教育外部产品做的很不够，社会参与度很少，这和美国的教育差异很大。中国社会民间力量的发育是一个问题，包括本科评估有人呼吁学习美国的中介机构，但是可能政府不肯放权，其次老百姓相信政府不相信民间中介机构。

讨论：这次本科评估中，我在做方案的时候很想把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作为考察指标加进来，但是比较难。评估中应该有在校学生的满意度调查，英国的高校就有，其实学生对学校的评价是很重要的。去年在上海做了针对四种学校 4000 个学生课外时间利用的调查，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然后是学习外国经验，也存在问题，很多是外国已经过时的经验。

讨论：教育部内部在好多方面也有不同意见，也有批评的，尤其讲到办学条件、规范管理等问题。评估是否作假，我没有调查过。我只参与了最后一个学校的评估，相对来说这个学校做得比较好，但是弊病还是有的。评估是肯定要做的，但是具体怎么做要考虑好。

讨论：我对温州大学教育模式有同感，我 9 月去了塔里木大学，这个大学在当地也是很有名的学校，塔里木地区甚至是南疆地区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塔里木大学培养的，对当地的发展贡献很大，这是其他学校不能替代的。

讨论：我也觉得这种情况其他地方也存在，我前几天到北京去，发现下面郊区学校的老师基本上都是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而不是北师大毕业的，上海也存在类似情况。地方高校对地方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讨论：纲要里面写的是评估政府是有限评估的，逐步利用和培养中介组织来适度参与。

讨论：教育部评估和本科评估还是不一样的。我们主张下一轮评估大部分要下放到省一级评估，但是评估中心不愿意，涉及到他们的利益。

讨论：中介、第三方评价是一个大趋势，中国现在还没有发育出有资深能力的中介组织，但是要向独立化方向发展，比如学会取消行政级别，实现自负盈亏。

讨论：教育部可以委托中介进行调查。更重要的还是要打破垄断，引进竞争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教育部不希望打破垄断，他有利益在里面。现在很多考试无法取消，就是因为有利益牵涉其中。譬如研究生教育很多专业课都是国家统考，法律、医学也要开始的，这都是不合理的。

十、 改革政府资源配置体制

与会专家认为应将政府资源配置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1、各级政府举办的大学是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主体部分，而政府负责这些大学最重要资源的配置(如经费拨款、国家或地方重点学科审批、招生指标安排乃至校级领导任命等)。

可以说,一所大学的发展方式、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在很大程度受到这些资源配置的约束。因此,政府的资源配置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导向性和杠杆效应。当前,高等教育的各项改革都需要不同程度的资源支持。事实上不少高校领导都花费很大精力去争取各种资源。如果资源配置不合理,就会影响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影响教育的公平和效率。

2、最近一项研究发现,部分 985 学校多重资源叠加后的效率并不明显。根据同一数据来源,我们对 2001-2007 年各高校的办学绩效,用同一个投入产出指标(即每亿元经费投入所实现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学科条件方面的产出)来测算,结果发现,排列前 10 名的高校中有 6 所并不是 985 学校,而是一些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学校。

3、近年来,教育部实施的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开始对部分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加大投入,这是政府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一项积极举措。的确,政府在进行教育资源配置时,应为各类高校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要将办学绩效作为资源配置的一项重要指标。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方向。只有坚持按绩效优先的原则配置教育资源,才能真正促使各类高校根据各自的办学优势,找准办学定位,明确办学类型、办学路径,不断提高自身办学质量,并由此不断完善我国高等教育体制。

讨论: 对高等学校应实行分类指导,绩效优先,我们现在的分类还是比较粗疏的,建议应该分为国立、省立和市立。国家还没有国立的提法,其实就是现在国家部委所属的大学,它们的财政来源都是中央财产。现在除了国立、省立大学,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市立大学。关于资源配置问题,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除了国立大学是公办的,省立、市立大学中有相当一部分大学可以转为私立,现在“私立”还是比较敏感的,可以转为社会化,实行社会所有制或混合所有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大的实力包办所有的高等教育。现在很多大学的经费远远低于一些城市小学的经费,质量从何谈起。政府没有能力举办那么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转为民营到底不可行,会不会加重负担?这种问题各种担忧都有,每个省可以拿出一些学校作为试点,是思路的问题。

讨论: 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的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由私立学校在承担的。

讨论: 民办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我国需要从体制上突破。

讨论: 独立学院的出现挤占了私立学校的空间。自考生为什么比普通高校学生地位低呢?其实自考、网络教育这些都是同样的,质量不差的。

十一、 转型期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与会专家近期对转型期的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研究,发现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高等教育发生了“三重转型”和“两种倾向”。

（一）西方高等教育改革经历的三重转型

从规模扩展转向质量保证；从自律为主转向共同治理；高等学校入学资格的平等主义倾向（从贵族哲学、精英哲学到平等主义）。

I. 转型期西方高等教育出现的两种倾向性高等教育思想基础的消费主义倾向，高等教育价值的功利化取向。

II. 高等教育改革的消费主义倾向

1、 专家观察意见：从注重学术的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转变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两次最重大的方向上的转变之一（另一次转变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现代大学取代古典学院）。

2、 学生：为保持高的 GPA（总评成绩），学生们对容易的课程感兴趣，缩短攻读学位的时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总会去读一些笔记而不是读原著（原因只是，笔记比原著更便宜，更易于理解），也总是要选修几门所谓没有价值的课程。

3、 家长们觉得：送孩子上学就像付钱买东西，付出了高昂的价钱，就要有所收获。不仅希望学生学到本领，而且还理所当然地指望得到优秀的成绩，获得就业或升学等其它方面的实际回报。

4、 管理者意见：“学生是我们的客户，有权获得最好的教育”，“学生也有选择教师的权利，低水平的教师会被学生淘汰”，“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是以顾客为中心，这种顾客导向的概念和教育理念一致”。

5、 如果说 20 世纪的质量观还是以“合格质量”为标准的话，那么，“用户满意”将是 21 世纪质量的最终标准。这就是说，学生消费者、社会消费者的需要和价值期望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调节器”，高等教育质量就是它满足“消费者”需要的程度。

从事该研究的专家也担心消费主义倾向在教育界里会导致的关键一点是教育质量只能由消费者来定义。在过去，大学是人才成长的摇篮，学术探究的殿堂，大学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人类平等的使者。但是今天，教学工作被忽视，大学偏离育人宗旨；高深学问贬值，大学偏离学术宗旨；效率优先，大学偏离平等宗旨；批判功能缺损，大学偏离良知宗旨。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无法回避的七对关系

以真理为本或以学生为本；遵循教育原则或外力控制；教授自律或社会问责（维护“3A”传统或服从“4A”现实）；学生适应课程或课程适应学生；强化学生是非观或成败观；强化合作精神或竞争意识；促进社会公益或个人升迁。此外，还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已有大量研究的许多问题。

如果能够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恰当地处理好这七对关系，中国的教育还是充满希望的。

自我们的研讨会结束后，有包括新华社在内的约 7 家媒体对会议的内容进行了报导。今后我们将会继续支持和主动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我们的建议。正如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所总结：“教育不仅是社会的热点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郭玉贵整理）

附录

出现研讨会专家名单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项贤明：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

许庆豫：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王 烽：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中心体制室副主任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谢仁业：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张晓鹏：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

潘艺林：华东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折延东：温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应望江：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马国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程 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

谭继军：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郭玉贵：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全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